

## 金文釋讀五則<sup>\*</sup>

湯志彪

麥茵茵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 摘 要

《集成》1767青銅鼎第一個銘文當釋作「申」；《集成》1967青銅鼎第一個字當釋作「𣎵」；《集成》2336青銅鼎第二個字當釋作「戠」；十年陳侯午敦銘文「平壽」兩字後面的字當釋作「造」或可讀作「祐」；越王太子矛的器主是越王者旨於賜的太子不壽，其製作年代定在西元前四六四至四五九年（或西元前458年）之間。

**關鍵詞：**銘文、申、𣎵、戠、不壽

---

<sup>\*</sup>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簡帛學大辭典」（批准號：14ZDB027）、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晉系題銘職官整理研究」（批准號：15BZS046）、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考古學視角下西周都城的社會結構研究」（批准號：17BKG017）、上海市教委科創重大項目「古陶文編」（批准號：2019-01-07-00-05-E00048）、二〇二〇年度高校古委會直接資助項目「先秦出土文獻與傳世古籍史事對比研究」（批准號：2056）資助。

## Five pieces of Notes o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Tang Zhi-biao

Mai Yin-yin

(Shanghai) Center for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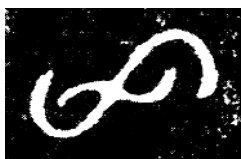
### Abstract

Some characters on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bronze tripods in *Jicheng* (《集成》) should be re-examined. The first character of the No.1767 and No.1967 should be explained as Shen (申) and Zhen (桡), respectively. The second character of the No.2336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Zhi (戠). The character that behind the words Pingshou (平壽) of the Shinian Chenhouwu Dui (十年陳侯午敦) inscriptions should read as Zao (造) or Gao (皐). The owner of the Yue Crown Prince Spear was the crown prince named Bushou (不壽) of the King called Zhezhiyuci (者旨於暘) of Yue. This spear was casted between B.C.464 to B.C.459 or B.C.458.

**Key words:** Bronze inscription, Shen (申), Zhen (桡), Zhi (戠), Bushou (不壽)

## 一

一九六七年九月，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葬出土一件青銅鼎（《集成》<sup>1</sup> 1767），上鑄銘文三字，第一字作：



一般作不識字處理<sup>2</sup>。《殷周金文集成引得》括注作「規」<sup>3</sup>。

按，將此字釋作「規」，目前不為學者所普遍採信，最新的甲骨文、金文工具書均未予收錄作「規」。甲骨文有「𠄎」（《合集》14549正）、「𠄎」（《合集》3844）等字，學者或釋作「畫」，或釋作「文（紋）」<sup>4</sup>。我們認為，「𠄎」當是「申」字。甲骨文有「申」字，形體與「𠄎」大體相近，其中有作「𠄎」、「𠄎」、「𠄎」等形的，金文中亦有作「𠄎」（《集成》4267申簋蓋）、「𠄎」（《集成》4267禦史競簋）等形的「申」字。山西曲沃曲村西周墓地出土的「申鼎」的「申」字也作「𠄎」形<sup>5</sup>。西周金文「申」字有橫書的例子，作「𠄎」形<sup>6</sup>，戰國文字中的「五」有作「𠄎」形者，「水」字有作「𠄎」形者，可資佐證<sup>7</sup>。兩相比較可知，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葬出土的這件青銅鼎的「𠄎」字與上引諸「申」字形體一致，只是此字寫得歪斜而已，故此字當釋作「申」。那麼這件鼎也當重新命名作「申鼎」。

<sup>1</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7-1994年）。為行文方便，下文徑省稱作《集成》，不再一一注出。

<sup>2</sup> 參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第2卷，頁107，第1767器；董蓮池：《新金文編》「附錄」（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下冊，頁124；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卷，頁319，第01067器。

<sup>3</sup>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202。

<sup>4</sup> 參看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181；白於藍：〈釋「斐」〉，氏著《拾遺錄——出土文獻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223-231。

<sup>5</sup>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卷，頁448，第01235器。

<sup>6</sup>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2194。

<sup>7</sup> 參看吳良寶：《先秦貨幣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218；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733。







## 二



故宮博物院藏一件青銅鼎，為西周中期時器，著錄於《集成》1967號器，上鑄銘文四字，第一字作：



對於這個字，《集成》隸作从木从貝从口<sup>8</sup>，《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從之，並括注作「桎」<sup>9</sup>。《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從《引得》所釋<sup>10</sup>。董蓮池先生作不識字處理放於附錄<sup>11</sup>。

按，此字左从「木」、右下角从「口」均無問題。但右上部不是「貝」字。「貝」字是貝殼的象形，甲骨文一般作「𠂔」、「𠂕」等形。金文形體多變，但基本不出：

					
A	B	C	D	E	F

等形。<sup>12</sup>這些「貝」字的最後三類即 D、E、F 諸形體與「」字右上角確實很接近，但細審可知，D、E、F 諸「貝」字形體上面兩個尖角會成一定角度的「V」形，並與中間的豎畫連接，中間的豎畫並不會穿出「貝」字上面兩個尖角所形成的「V」形。另外，表示「貝殼」下部的筆畫十分彎曲。然而「」字右上角的部分構型，上部筆畫是平直的，並沒有出現「V」字形，此構型中間的豎畫明顯穿出字形，形成「W」形。至於下部，彎曲程度亦與「貝」字存在區別。可見，把這個構件看作「貝」略嫌不妥。我們懷疑此部分構件當是「朕」字所从的「𠂔」。「朕」字一般作：

<sup>8</sup> 參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第2卷，頁137，第1967器。

<sup>9</sup>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142。

<sup>10</sup>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卷，頁27，第01319器。

<sup>11</sup> 董蓮池：《新金文編》「附錄」（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下冊，頁54。

<sup>12</sup>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下冊，頁798-802。



但也有作，以下二種形<sup>13</sup>：



最後一個形體的「朕」字見於西周早期的天亡簋，此字所从的「𠂔」與我們要討論的字類似，則「𠂔」字所从當與天亡簋的「朕」所从有字形上的承接關係。只是「𠂔」字右上角所从的豎筆稍微短了一點。至於「𠂔」聲下从「口」的例子也見於西周金文。伯家父鬲（《集成》682）有「𠂔」字，作：



古文字「𠂔」从「針」聲，細審可知，古文字偏旁變動不居，此處的「𠂔」字也有「口」旁，當是从聲符「𠂔」字下部而挪至左邊。這就是說，「𠂔」字右上角的部分也表示兩手捧著一個針類物體的象形。那麼，這個字當從木從口從「𠂔」（「朕」字所從），「口」當是飾筆，下文要討論的「戠」字形體，有「口」與無「口」旁無別，就是很好的例子。故「𠂔」是「𠂔」字。「𠂔」字見於《說文》。《說文》：「𠂔，槌之橫者也。關西謂之𠂔。從木𠂔聲。」「𠂔」即「朕」字所從聲符。銘文此字用作人名。

### 三

德國陶德曼先生收藏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銅鼎，上鑄銘文八字，其中第二字作：

<sup>13</sup>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下冊，頁1208-1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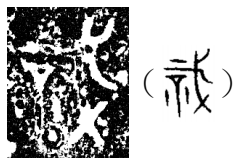


《集成》隸作从示从弋的「戠」<sup>14</sup>。《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隸作从示从戈的「戠」<sup>15</sup>。《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從《引得》所釋<sup>16</sup>。

按，不管把此字隸「戠」還是「戠」，都是不對的。甲骨文有「戠」字，形體較多，其中有作：



「戠」字也見於何尊，作<sup>17</sup>：



「戠」與上引甲骨文的「戠」字相比，僅是「戠」偏旁兩側多了兩個小點飾筆，這正與「何尊」上的「戠」字一致。可見，「戠」亦當釋作「戠」。

#### 四

十年陳侯午敦（《集成》04648）有以下銘文：

諸侯宮（享）台（以）吉金，用作（作）平壽器敦，台（以）登（烝）台（以）嘗，保有齊邦。



「器」字上一字，《商周青銅器銘文選》釋作「造」，無說<sup>18</sup>。《集成》、孫剛先

<sup>14</sup> 參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第2卷，頁207，第2336器。

<sup>15</sup>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205。

<sup>16</sup>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卷，頁449，第01784器。

<sup>17</sup> 拓本《集成》6014「何尊」，摹本引自：容庚：《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828。

生、張振謙先生從之<sup>19</sup>。《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隸作「適」字<sup>20</sup>，《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從之<sup>21</sup>。

按，把這個字釋作從辵從舌是有問題的。「舌」字從無這類形體，可參看《戰國文字編》「舌」字字形<sup>22</sup>。

「造」字金文習見，其中有作下列字形：



(《集成》2326史造作父癸鼎)



(《集成》011260陳侯因諡戈)



(《集成》011035陳余戈)

這些「造」字，與我們所討論的字形體基本一致，尤其是後兩例與「十年陳侯午敦」均是齊國器物，字形上部尚有彎曲狀。可見，此字釋作「造」，確不可易。此處「造器」的「造」當訓作「祭祀」義。《周禮·春官·大祝》：「二曰造。」鄭玄注引杜子春言：「造，祭于祖也。」《周禮·春官·大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賈公彥疏：「造者，以其非時而祭，造次之意。」《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禴。」鄭玄注：「類、宜、造，皆祭名。」

當然，「造」字也可讀作「禱」。上古音「造」、「禱」均是幽部字，「造」和「禱」均從「告」得聲，故自可通。《說文》：「禱，告祭也。」《玉篇》：「禱，禱也。告祭也。」《廣韻·皓韻》：「禱，禱也。」「禱」本身就有「祭」義。《廣雅·釋天》：「禱，祭也。」《廣韻·號韻》：「禱，祭也。」《文選·高唐賦》：「進純犧，禱璇室。」李善注：「禱，祭也。」典籍習見「祭器」一詞。不贅。可見，十年陳侯午敦「造（禱）器」就是「祭器」，相當於見於十四年陳侯午敦和陳侯因胄敦的「祭器」。


<sup>18</sup>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卷，頁559。

<sup>19</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第3卷，頁593，第4648器；孫剛：《齊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40；張振謙：《齊魯文字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頁246。

<sup>20</sup>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99。

<sup>21</sup>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卷，頁346，第06079器。

<sup>22</sup>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30。

十四年陳侯午敦（《集成》04646）言：「陳侯午台（以）群者（諸）侯獻金乍（作）皇妣孝大妃祭器錢敦，台（以）登（烝）台（以）嘗，保又（有）齊邦。」陳侯因甬敦（《集成》04649）言：「者（諸）侯寔薦吉金，用乍（作）孝武桓公祭器敦，台（以）登（烝）台（以）嘗，保有齊邦。」這兩個器都是陳侯所作，而十四年陳侯午敦與十年陳侯午敦器主均為「陳侯午」，同時，上引三個器的銘文無論從用語還是句子結構來看，都相同或相近。在十四年陳侯午敦和陳侯因甬敦的銘文中，與十年陳侯午敦「造器敦」這一用語處於相同位置的分別是「祭器錢敦」和「祭器敦」，可見，十年陳侯午敦「造」字所表達的意思與上述兩器銘文的「祭」字相同。因此，把十年陳侯午敦的「」字釋讀作「造」或通假作「𡥉」應該都是可信的。

## 五

《集成》11544越王太子矛銘文言：

於戊<sub>呂</sub>王旨<sub>𠄎</sub>之太子不<sub>𠄎</sub>自乍（作）元用矛。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把銘文釋作：「於戊（越）<sub>𠄎</sub>王<sub>𠄎</sub>之太子<sub>𠄎</sub>（壽）自乍（作）元用矛。」認為王<sub>𠄎</sub>即越王翳，乃州句之子。翳是<sub>𠄎</sub>短音，實即<sub>𠄎</sub>是翳的越音。並將「太子<sub>𠄎</sub>」讀作「太子諸咎」，謂：「<sub>𠄎</sub>去其鳥形裝飾，為從<sub>𠄎</sub>中有<sub>𠄎</sub>，<sub>𠄎</sub>疑為<sub>𠄎</sub>從米之簡化。……<sub>𠄎</sub>，即壽字所得聲。<sub>𠄎</sub>應是諸咎的對音，諸、<sub>𠄎</sub>為音變；<sub>𠄎</sub>、咎同幽部。此諸咎為太子時所鑄之矛，相當於周威烈王和安王之世。」<sup>23</sup>

《殷周金文集成釋文》把「子」後兩字釋作「州句」<sup>24</sup>。《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則將之釋作「三壽」<sup>25</sup>。

董楚平先生認為，此銘文第一字、第三字以及「<sub>𠄎</sub>」字都是它器的銘文，而被誤植於此，他把銘文讀作：「戊（越）〔者〕旨於〔賜〕之太子<sub>𠄎</sub>壽，自乍元用矛。」並認為此器是「者旨於賜」為王時所作<sup>26</sup>。

<sup>23</sup>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379。

<sup>24</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第6卷，頁595，第11544器。

<sup>25</sup>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364。

<sup>26</sup> 董楚平：《吳越徐舒金文集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19-221。

曹錦炎先生則把銘文讀作「於戊（越）呂（台）王旨於之大（太）子伏（不）𠂔（壽），自乍（作）元用矛。」他認為「呂王」應讀作「嗣王」，「旨於」是越王「者旨於賜」的簡省，是吳越一帶銅器銘文的習慣寫法。「伏𠂔」即「不壽」，即見於《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及《竹書紀年》「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次竹句立」中的「不壽」，而「王鼫」也就是「越王者旨於賜」。同時，曹先生還指出，根據「越王太子矛」銘文可知《史記》和《竹書紀年》所記可信。但在最後總結的時候又說：「根據銘文，稱者旨於賜為嗣王，可知其尚未繼位，所以本器的製作年代當在越王者旨於賜元年即西元前464年之前。」<sup>27</sup>後來，曹先生改變了原來對「伏𠂔」的解釋，直接把這兩個字釋作「不壽」<sup>28</sup>。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把銘文釋讀作：「於戊（越）呂（台）王旨醫之大（太）子不𠂔（壽），自乍（作）元用矛。」<sup>29</sup>

按，所謂的「銘文誤植說」是不能成立的。從原拓片來看，銘文一氣呵成，各銘文形體相同，「誤植說」並無可靠的證據。至於為什麼越國會自稱「於越」，曹錦炎先生在《鳥蟲書通考》一書中已經有了詳盡的考釋，可參看<sup>30</sup>。此外，「太子」一詞後面的那個字與「𠂔」字字形相去甚遠。可見，董楚平先生的釋文並不可信。

把「𠂔」釋作「三」也是不對的。越國銘文中尚未見到寫作「川」形的「三」字。而「𠂔」也不可能讀作「諸」，上古音「𠂔」是見母覺部字，「諸」是章母魚部字，兩字韻部相隔殊遠，文獻未見兩字相通之證。

至於《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認為「弋𠂔」即越王翳的觀點，董楚平先生已指出其非<sup>31</sup>。不贅。

其實，從字形字義來看，把「呂王」讀作「嗣王」、「太子」讀作「太子」、「伏𠂔」直接釋為「不壽」都是可信的。然而，董楚平和曹錦炎兩位先生都認為此矛的器主是越王者旨於賜則可商。越王太子矛的器主以及此矛的年代需重新思考。

需要首先說明的是，「旨於之太子不壽」一句中的「之」字表明，本句銘文

<sup>27</sup>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頁74-75。

<sup>28</sup> 曹錦炎：〈記新發現的越王不壽劍〉，《文物》2002年第2期。

<sup>29</sup>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卷，頁111，第17678器。

<sup>30</sup>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頁74。

<sup>31</sup> 董楚平：《吳越徐舒金文集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21。

的主語是「不壽」，而前文的「於越嗣王」是對「不壽」身份的一個說明，與「旨於之太子不壽」是同位語的關係。若按曹錦炎先生的標點，則兵器主人不是「於越嗣王」，而是「於越嗣王旨於之太子」。如此一來，整句銘文主語不明。

我們認為，「越王太子矛」的銘文當重新寫定並標點如下：

於戊（越）呂（嗣）王，旨於之大（太）子不𣦵（壽），自作（作）元用矛。

本矛的器主應是越王者旨於賜的太子不壽。根據曹錦炎先生的解釋，「呂王」即「嗣王」，古代太子又稱儲君，即下一代君主，也即「嗣王」。古書有「嗣王」一詞。偽古文《尚書·太甲上》：「惟嗣王不惠於阿衡。」《尚書·多士》：「在今後嗣王，誕罔顯於天。」《逸周書·諡法》：「維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大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於牧之野，將葬，乃製作諡。」均其例。

上文曹錦炎先生所引的《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和《竹書紀年》都已明確記載，者旨於賜死後，不壽立為越王，可證。

確定了器主，下面就對這件矛的製作年代作一個簡單的探討。

據上文分析，不壽是越王者旨於賜的太子，那麼不壽立為太子的年代必然是者旨於賜當上越王之後。換句話說，此矛應該在者旨於賜元年到不壽立為越王的元年這段時間所鑄造的。曹錦炎先生曾指出，越王者旨於賜的在位時間是西元前四六四至四五九年，越王不壽在位的時間是西元前四五八至四四九年<sup>32</sup>。如果這個說法不誤，那麼我們就可以把越王太子矛的製作年代定在西元前四六四至四五九（或西元前458年）年之間。

## 參考文獻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4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7-1994年。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sup>32</sup> 曹錦炎：〈記新發現的越王不壽劍〉，《文物》2002年第2期。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